

政治变革与“学统”调适： 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的断裂性演化^{*}

程文侠

内容提要：学界通常将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发端标志。然而，这一共识忽视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讲授现代政治知识的课程首先出现于维新派兴办的地方性学校。联系维新运动以来直到民国初年的政治变革进程，并结合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观察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生成演化的历史逻辑，可以发现，帝制国家的“政统”与“学统”高度绑定，政治变革要求引入新的政治知识和培育新型政治精英，并建立新式“政学”，政治变革推动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形塑了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的演化进程。从帝制国家的维新变法到预备立宪，再到共和革命，中国政治变革道路发生了断裂性变化，中国政治学也由此经历断裂性演化，从儒学底色的“政学”模式转向了日式法政科模式，转到了美式政治学系模式。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 政治变革 政治精英 高等教育 政治学史

一、引言

政治学是以国家为论述对象的知识体系。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乏深刻的政治观察和政治思想，但是中国政治学却是晚清西学东渐后出现的事物^①。关于中国政治学的起源，学界存在一个基本共识，即京师大学堂政治学专门课程的开设是中国政治学的起点。

赵宝煦指出，1903年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科”课程标志着中国政治学的开端^②。王一程同意赵宝煦的看法，将1903年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作为中国政治学的起点^③。金安平则在档案爬梳基础上提出更为准确的看法。她发现，“1899年9月京师大学堂政治专门讲堂的设立是北京大学政治学系最早的学科渊源和组织渊源”^④。俞可平和王浦劬等学者都赞同金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百年来中国政治学史研究”（19ZDA133）的研究成果。感谢编辑部老师及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

① 林尚立：《为中国政治学寻求学术支撑》，《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② 赵宝煦：《中国政治学的百年历程》，《东南学术》，2000年第2期。

③ 王一程：《当代中国政治学与政治发展》，《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4期。

④ 金安平：《中国近代转型的学术折射——北京大学政治学学科与学系的建立》，《北大政治学评论》，2018年第1期。

安平的判断,把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作为中国政治学的历史源头^①。尽管在中国政治学起源具体时间上存在认识差异,但学者们都认同中国政治学发轫于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这一观点。

众所周知,京师大学堂是帝制国家中央政府建立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就此而言,学界判定中国政治学开端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二是讲授现代政治知识的课程(以下简称“政治学课程”)的设置。从这两个依据可以看出,中国政治学起源的基本共识其实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和一个假定前提的推论。历史事实是,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京师大学堂在戊戌变法后不久开设了政治学课程。假定前提是,没有其他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在戊戌变法前开设政治学课程。

基本共识的事实基础毋庸置疑,但是其假定前提并非不能讨论。假定前提可以进一步细分为两个命题:或是京师大学堂之前不存在其他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或是其他现代高等教育机构没有早于京师大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显然,第一个命题不符合中国教育史研究者的判断。他们认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轫”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②,洋务学堂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肇始”^③。第二个命题可能就更具争议性。在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前,维新派主持的地方性学堂就设置了政治学课程。早在甲午战争前,康有为就在万木草堂设立“政治原理学、中国政治沿革得失、万国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等政治学课程^④。在戊戌变法前,梁启超主持的湖南时务学堂也设立了类似课程^⑤。

有论者可能会指出维新派地方性学堂不是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维新学堂开设政治学课程不足以撼动中国政治学起源的基本共识。然而,这种观点可能忽视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脉络。维新派是继洋务运动失败后而兴起的政治势力,维新学堂是对洋务学堂的批判性改进。教育史学者将洋务学堂视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那么将维新学堂排除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之外就似乎于理不通。更重要的是,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的遗产。从倡议建立到设计章程,京师大学堂凝结了维新派的政治愿景和办学经验。肯定京师学堂的意义本无可厚非,但低估地方学堂的价值就似有不妥。本文的目的不是挑战和否定学界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端的基本共识,而是希望打捞被历史长河淹没的信息。在此基础上,讨论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生成演化的历史逻辑。

二、政治学史:政治进程与学科认知

既有的中国政治学史研究忽视了关照现代高等教育生成进程,没有论及中国现代教育发展背后政治变革进程的作用。我们将紧扣中国政治学起源共识背后的两个依据(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政治学课程设置),努力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为避免误解,有必要对政治进程与两个依据的关系进行一定的说明。

① 王浦劬:《近代中国政治学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3期;俞可平:《中国政治学四十年》,《北大政治学评论》,2019年第1期。

② 郑登云编:《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第19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③ 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第9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④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66辑,第32页,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

⑤ 参见梁启超:《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410-4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一) 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与现代政治精英生产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Bourdieu)认为高等教育机构是一种权力再生产的场域^①。在现代社会早期,政治精英生产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性功能。

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大学,起源于天主教修道院。大学的最初目的是调和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其最初功能是进行教义的学理研究和培养宗教精英^②。随着社会的世俗化,大学功能得到扩展,成为培养精英职业人士机构^③。早期,大学(university)只有哲学、神学、法学和医学等四个“学院”(faculty)。其中,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分别对应工业革命前的三种主要“精英职业”(教士、律师和医生)。哲学、神学、法学等“学院”毕业生可直接在政府机构任职。应当注意的是,现代早期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精英生产功能并没有分殊化(differentiation),高等教育机构整体(大学)而不是其次级分支学院(“faculty”)承担了政治精英生产职责。如德国大学培养政治精英和讲授政治知识的课程一度分散在哲学院和法学院^④,美国高等教育机构训练政治精英的活动一度放在了庞杂的“经典学”(classics)课程中^⑤。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是在西方示范效应下产生的。同样,中国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一项基本职能是培育和输送现代政治行政人才。当然,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在生成进程中也展现出自身的特点。其中,书院传统即是一例。书院始于唐宋,自产生以来就与科举制紧密相关。亦官亦学的教师可在书院讲授“经世济民之学”,而学子则可在书院内准备科举考试。清代雍正以后,书院逐渐颓败。甲午战败,有识之士提议“整顿书院”以为国育才。其后,清廷下令将书院“改为兼习西学中学之学校”^⑥。

相比西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国家在场性更为突出,国家通过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培育新型政治精英的要求更为迫切。就政治进程的逻辑关系而言,现代政治精英生产发生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之前;就教育进程的逻辑关系而言,现代政治精英生产又发生在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出现之后。政治变革的需要提出了生产新型政治精英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在承接现代政治精英生产任务过程中出现。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学结构是政治学课程,而政治学课程设置的教育功能是生产现代政治精英,现代政治精英生产所希望的教育后果是推动政治变革(见图1)。

(二) 政治学课程设置与政治知识

现代政治精英生产是通过设置政治学课程,进行政治教育而实现的。在高等教育机构中,讲授现代政治知识的政治学课程的集聚,推动了分殊化系科建制的出现。

美国常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学的发源地,美国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可能干扰了人们对中国政治学史的认识。因此,有必要对国际经验作简要回顾以厘清基本事实。学界通常将188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建立视为现代政治学的开端。然而,这个判断是具有一定误导性的。早在1872年,法国的巴黎政治学院就已存在。按照美国政治学史权威学者的说法,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是在巴黎政治学院的启发下建立的^⑦。巴黎政治学院由一些法国知识分子创立,他们有感于当时法国政治精英在应对拿破仑三世倒台、巴黎公社起义等政治危机中表现出的现代政治

① 参见P·布尔迪厄:《国家精英——名牌大学和群体精神》,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②④ 弗里德里希·包尔生:《德国大学与大学学习》,第13-14页,第24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③ Roger Geige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and Culture from The Founding to World War I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7-12.

⑤⑦ 德怀特·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上册),第31页,第42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⑥ 参见盛朗西编:《中国书院制度》,第217-227页,中华书局,1934年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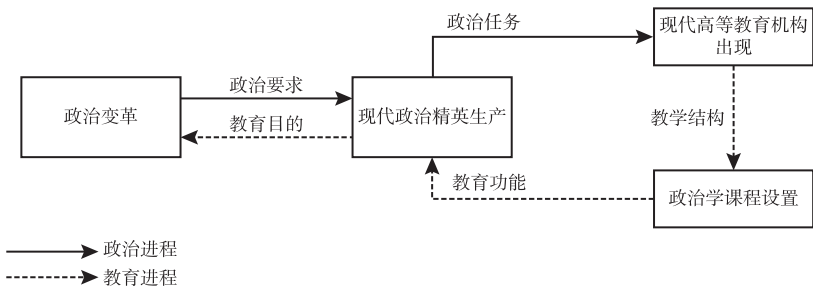


图 1 政治进程与教育进程逻辑示意图

知识的贫乏,建立了一所新型的机构,试图为法国造就合格的政治行政人才^①。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的建立初衷与巴黎政治学院有相通之处,它的目的之一是改良美国政府机构,培养具备现代视野的政治行政人才^②。当时,美国政府也面临现代化转型问题,一些改革人士极力主张实行“文官制度”,让掌握现代知识的精英执掌权柄。当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与巴黎政治学院之间也有差异。后者是在当时法国既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外另起炉灶,而前者却是附着在美国既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之内的增量改进。另外,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school)的中文译名也会给国人带来误导性联想。19 世纪 80 年代,哥伦比亚大学本身还处于从小规模“学院”(college)向机构庞大的现代大学(university)的转型初期,其所谓的政治学院只是仅有两个教职(faculty)的项目组(program)。

19 世纪后期,既有高等教育模式难以适应急剧的社会变迁,难以培养胜任时代变化的政治行政人才。在政治变迁过程中,法美两国都提出了培育新型政治精英的任务。同时,随着社会分工的复杂化,高等教育机构也发生了重组分化。原来分散的政治课程逐渐集中为一个专业性独立性的机构,由此推动了政治学的独立学科建制的出现。法国的政治学专科性学校和美国的大学内政治学院是政治学独立学科建制的两种形态。

将政治精英生产带入学科发展回顾可能并不符合主流政治学史的叙事,但是主流叙事不是没有盲点的。考察美国高等教育史会发现,美国政治学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支脉,起源于探索应对美国现实问题的需要^③。然而,美国早期的社会科学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模糊,美国垄断资本通过控制大学拨款和教职晋升等方式,逐渐迫使美国社会科学界弱化行动倾向,专注于研究客观性知识^④。美国政治学界在反思其历史时也注意到这种片面性。有人批评美国政治学在价值中立的旗号下逐渐淡忘了本应承担的行动主义职责^⑤。由于美国政治学的行动主义功能发生萎缩,美国范式下的政治学史研究往往忽视了政治进程中教育发展的历史动力。为弥补既有研究的缺陷,本文将在新的坐标下讨论中国政治学起源问题。

① 参见维基百科词条:Sciences Po,2012 年 8 月 13 日,https://en.wikipedia.org/wiki/Sciences_Po,2019 年 4 月 24 日。
② Robert, Adcock, *Liberalism and the Emergence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 Transatlantic Tal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p. 116。
③ 参见 John R. Thelin, *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参见 Mary O. Furner, *Advocacy and Objectivity: A Crisis in The Professionalization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Lexington: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5. p. 130 - 159。
⑤ Peter N. Ubertaccio and Brien J. Cook, “Wilson’s Failure: Roots of Contention about The Meaning of Science of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0, No. 4, 2006。

三、维新运动与儒学底色的“政学”

维新运动是对洋务运动变革进程的推进,维新学堂是对洋务学堂教育发展进程的推进。正是在对洋务学堂缺陷反思的基础上,维新派推动建立了儒学底色的“政学”专科性学校。

(一)从“艺学”到“政学”

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端于洋务派兴办的专科性学校,讲授“技艺之学”的洋务学堂是中国最早的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震于列强之船坚炮利,急须养成翻译与制造船械及海陆军之人才”^①,于是创办了一批“艺学”学堂^②。如外语类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等,军事类的福建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等,技术类的江南制造总局工艺学堂、天津电报学堂等,三者虽各有侧重,但都是技艺性新式学校。

洋务派曾提议将新式学校与科举制相嫁接,招收科甲出身人员“学习天文算术,以为制造轮船、洋枪之用”^③。守旧派大臣倭仁极力反对^④。其理由主要有二:第一,儒家立国之道在礼义人心,技艺之学是旁支末流。第二,社会政治秩序的维持有赖于儒士树立礼义典范,科甲士子“变而从夷”会削弱其引领世道人心的权威。倭仁的论断固然表现出守旧派的顽固颞预,但也触及了帝制国家的制度本质。帝制国家的“政统”和“学统”高度绑定,引入新的知识可能消解儒家“学统”,造成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动摇。正是顾及到这种危险,清廷对发展技艺性学校非常慎重,造成其长期游离于国家的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之外,难以为社会所认可^⑤。

甲午战争中,清廷败于日本。外部危机将守旧派的担忧边缘化,为维新派推动变法创造了条件。梁启超将洋务运动也视为一种变法,并认为其久而无功是因为“不知本原”^⑥。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启动,造成不同结局的根源是日本重“学业”“官制”,而中国重“船炮之利”。洋务派的错误在于只在“练兵”“开矿”等技术性事务下功夫,只重培养“艺学”人才,“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⑦,致使“靡巨万之经费,只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⑧。

梁启超主张仿效巴黎政治学院建立专门学校培养新型政治精英^⑨。他认为“惟政治学院一门,于中国为最可行,而于今日为最有用”;政治学以“公理公法为经”,以“古史为纬”,“以近政近事为用”,使得学员能够将“救乱扶危”的“道”“法”“事”三者融会贯通,发展政治学院最契合当时急务。他进而指出,政治学院“当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培养“政才”以振兴“艺事”。在梁启超看来,通过培养知晓新政新法的政治精英,进行政治变革,才能为技艺革新开拓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设想的新式“政学”学校不是对西方知识的一味引进,而是在儒家知识体系底色之上对西方知识的借鉴利用,他认为学校课程应该“中西兼举”,“以六经诸子为经”而辅之以西人公理公法,“以历朝掌故为纬”而辅之以希腊罗马古史,“以按切当今时势为用”

① 《清史稿·选举志(节录)》,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第2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② 董宝良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第15-31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③ 张盛藻:《请同文馆无庸招集正途疏》,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④ 倭仁:《请罢同文馆用正途人员习天算折》,黄仁贤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第8页。

⑤ 刘海峰:《高等教育史》,第108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⑥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29页。

⑦ 梁启超:《论学校——总论》,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38页。

⑧ 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297页。

⑨ 参见孙宏云:《小野冢喜平次与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形成》,《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

而辅之以各国近政近事。

可能是顾及到清廷对新事物的抗拒倾向,梁启超主张将新式学校嫁接在传统儒家教育体制上,提出不必取政治学院之名,而可用“政治学院之意”,以“时务一门”统摄经学、史学、地学、算学,“庶于西人政治学院之规模稍有所合”^①。不久后,梁启超担任了一所新式学校的总教习,学校名称中就有“时务”二字。

(二)从湖南时务学堂到京师大学堂

梁启超建立“政学”新式学校的主张首先得到了地方官员的支持,他得以在地方落实其办学理念。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受到光绪帝的重用,梁启超又在京师推行“政学”学校的办学模式。

百日维新前,梁启超受聘为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梁启超到任之后,着手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规章制度,将其“政学”学校的办学理念贯穿其中。他规定,学堂教学内容是“六经诸子”与“西人公理公法”的结合,同时将“历朝掌故沿革得失”与“希腊罗马古史”相参照,将当代“天下郡国利病”与“西国近史宪法章程及各国报章”相联系^②。为此,梁启超拟定了详细的课程表。课程分为必修性的“普通”课和选修性的“专门”课,必修课的课程有经学、诸子学和公理学等三门课程,选修课的课程有公法学、掌故学和格算学等三门课程^③。除格算学之外,湖南时务学堂的课程几乎全是梁启超所定义的“政学”的内容。

梁启超开办“政学”学校的主张得到中央大员的赞赏。刑部侍郎李端棻“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邦制度”^④。甲午之后不久,李端棻上书光绪帝。在给光绪帝奏折中,李端棻同样批评洋务“艺学”学堂没有“肆及”富强之原,建议推广新式“政学”学校^⑤。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听从李端棻的建议,下诏督办京师大学堂。其后,梁启超受命起草京师大学堂章程^⑥。章程强调“设立学堂之意,乃欲培非常之才,以备他日特达之用”。也就是说,京师大学堂的目的是培育新型政治精英以推动变法革新。所以其课程设计与洋务学堂差异明显,“政学”内容占了很大比例。梁启超所起草的章程以总理衙门的名义上奏,京师大学堂的实际课程安排大体按照梁启超起草的章程实行^⑦。维新派建立新式学校和设置“政学”课程的旨归是培育现代政治人才和推动政治变革,希望凭此突破传统政治对富国强兵之术的结构性限制。就此而言,京师大学堂与其说是一个现代高等教育机构,还不如说是一种新式政治机构,与其说重在“新学”,还不如说重在“新政”。可能正因为此,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京师大学堂,其实际操办者不是教育主管机构的礼部官员,而是主管人事任命的吏部尚书。

维新派筹建京师大学堂暗含着改革科举制的主张。在梁启超起草的章程中,招生对象是科举功名低微的读书人,学生经过大学堂培养,毕业后获得高级功名,直接“授以职事,以佐新政”^⑧。可是,这一主张被主事者孙家鼐所否决。孙家鼐将招生对象限定在已经取得进士举人科甲功名的京官,并将毕业学员交给既有官僚机构(六部)任用^⑨。此举将新式学校办成旧官僚(现

① 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9集,第621-623页。

② 梁启超:《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298页。

③ 梁启超:《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410-416页。

④ 赵尔巽编:《清史稿》,第42册,第12739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⑤ 《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折》,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484-48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⑥⑧ 梁启超:《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汤志钧、汤仁泽编:《梁启超全集》,第1集,第450-460页,第454-455页。

⑦ 金安平:《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发端与拓展》,第33-35页。

⑨ 《孙家鼐奏覆筹办大学堂情形折》,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册,第47-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任官员)的政治培训机构,表面上与梁启超办学理念差异不大,实质上却违背了维新派变法原则。维新派试图将新式“政学”学校建设为推动帝制国家政治体制变化和教育体制变革的枢纽,通过京师大学堂的招生和教育,在科举制之外进行增量性变革,部分替代科举制的政治精英生产功能。孙家鼐却将京师大学堂建立在科举制的前提上,从而消解了新式学校的预定功能。

四、清末新政与“以日为师”的法政科

科举制既是帝制国家政治体制与教育体制相互衔接的重要环节,也是儒学知识体系传承的关键步骤。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变革势力试图调适儒学知识体系和改革科举制。晚清新政时期,帝制国家学习日本教育体制,设立了法政科学堂。

(一) 体用之间的“政治之学”

维新派的变法是托古改制,试图用更古老的学说否定当时儒学内部主流知识体系,乘机将现代政治知识比附在儒家古老学说之上。这种办法的立意是重新发现传统,但如路德宗教改革,其后果却是颠覆性的。此外,维新派也掩盖了现代政治知识与儒学知识体系的逻辑张力,回避了帝制国家的政治体制(“政统”)与儒学知识体系(“学统”)相互锁定的困局。在这些方面,张之洞比维新派更为老练。他试图通过阐述“中体西用”,来解决“政统”与“学统”相互缠绕的难题,为引入现代政治知识创造空间。

张之洞认为,“中学”是旧学,“西学”是新学^①;顽固派“愚害道”而“守旧学”,维新派“图救时”而“言新学”,前者“不知道”,后者“不知本”^②。在情感立场上,张之洞更接近顽固派,他担忧现代知识与传统儒学知识之间的张力,提防引进现代知识的潜在颠覆性。他认为,“中学”是永恒不变的天道纲常,维系着帝制国家的秩序。如果引进“西学”方法不当,则会动摇国家根本。与顽固派不同的是,张之洞深知西方各国“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已让中国无法匹敌,如不奋起直追则“中国尽为西人所役”^③。张之洞主张在“中学”本体之上利用“西学”。为此,他对西学进行了重新阐释。张之洞指出,“西学”是西方诸国百年来国际竞争的智力结晶,包含着士、农、工、商、兵等各群体的“智”^④。儒家推崇“仁义礼智信”,“智”是属于儒学知识体系内的共识性范畴。张之洞将西学提升到“智”的高度,这就清除了引进西学的思想障碍。张之洞进而将西学分为“政学”和“艺学”两类,前者是士绅的智慧结晶,后者是农、工、商、兵的智慧结晶。士为四民之首,“士不智,农工商兵不得而智也。政治之学不讲,工艺之学不得而行”^⑤。所以,关键是发展凝结了西方“教养富强”智慧的“政治之学”。

“士之智”既意味着体认价值性纲常,也意味着具备工具性才智,就此而言,“政治之学”就在体用之间。张之洞的方案既摆脱了洋务派片面发展技艺的陷阱,又避免了维新派否定儒学主流的争议。实践中,推行“中体西用”却面临着科举制对知识体系的锁定问题。科举制是学子的“进身之阶”^⑥。科举制的光环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如果不变革科举制的话,再怎么强调提升“士之智”,再怎么重视“政治之学”,也只是事倍功半。所以,张之洞建议在科举考试中压缩四书五经的比重,加入“政治之学”的内容。

(二) 从“政治学专门”到法政科

庚子事变后,清廷朝野上下政治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学习西法抵御外侮的愿望压倒了对引

①②③④⑤⑥ 张之洞:《劝学篇》,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9740页,第9749页,第9704页,第9724页,第9734-9735页,第9735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人西学破坏纲常的担忧。帝制国家废除了科举制,法政科学堂获得了广泛发展。

在启动“新政”的上谕中,清廷倡议“更法令”“破积习”“求振作”^①。张之洞回应了清廷号召,写出了清末新政的纲领性文件“江楚会奏”^②。在“江楚会奏”中,张之洞的看法发生变化,比之前“中体西用论”激进得多。他主张应该建立现代高等教育体制,替代科举制的政治精英生产功能。在张之洞看来,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学子“见闻不广,学业不实”。日本在师法西方“育才兴学”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就,中国仿照日本现代教育模式可以省去摸索成本。张之洞以日本为榜样,将新式学堂分为小、中、高、大四类。其中,州县设立小学堂,道府设立中学堂,省城设立高等学堂,京城设立大学堂。地方高等学堂和中央大学堂都属于高等教育机构,两者在内部并无严格区分,都可有经学、史学、格致学、政治学、兵学、农学、工学等七“专门”(政治学是七“专门”之一)^③。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政治功能上,前者要替代乡试,后者要替代会试,以十年为期废除科举制。

“江楚会奏”的重要观点后来成为清末新政的法令。清廷颁布的“癸卯学制”,体现了模仿日本教育体制的明显痕迹。日本高等教育体制是分科模式,帝国大学之下设六分科大学,分别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理科大学和农科大学,其中法科大学又分为法律学和政治学两部^④。“癸卯学制”规定京城设立大学堂和省城设立高等学堂,大学堂下设八分科大学,分别为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省城高等学堂只要求有三科。除了添加经学科和商科,“癸卯学制”几乎照搬了日本模式。“江楚会奏”中,政治学门是七专门之一。“癸卯学制”中,政治学门被改为政法科(下设政治学门和法律学门),政法科是八分科之一,对应的是日本的法科。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日本法科大学是参照西方大学的法学院而建立,但其主要功能却不是训练执业律师,而是为国家培养和输送政治精英^⑤,就其功能而言,法科称谓就显得名不符实。然而,日本法科课程以西方现代法律知识为主,且日本政治变革方式是以引进新法推动新政,称之法科也未尝不可。

日俄战争后,清廷进而学习日本以新法带新政的变革方式,并将官制议定和法律厘定作为“廓清积弊”的重点^⑥。官制改革以接轨立宪政体为目标,从此新政从属于新法,“法”在“政”上。“仿行宪政”让传统性用语更加淡化,学科称谓就从“预备立宪”前的“政法科”变为了“法政科”。称谓变化折射出政治变革进程中儒家“学统”的式微。在“癸卯学制”中,模仿日本高等教育体制受到了“中体西用”原则的平衡。张之洞等人的思路是将儒学经典视为教育体制建设的本源,所以经学是居于统摄地位的首要学科^⑦。而中国历史经验则是政治在律法之上,所以日本教育体制中的“法科”就被改为“政法科”。“预备立宪”前的高等教育体制逻辑首先是“经”在“政”上,然后是“政”在“法”上。“预备立宪”后,帝制国家的变革不必再从儒家“学统”中找依据,儒学经典被虚置,宪法理念成为官制改革的依归,法律厘定成为新政的抓手,“法”既在“政”之上,又在“政”之中。在此脉络下,学科称谓改为“法政科”就更加名正言顺。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26册,第460-46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②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③ 张之洞:《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2册,第1393-1406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 吴光辉:《转型与建构——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研究》,第162-163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

⑤ 高柳健藏:《日本之法律教育》,《法学杂志》(上海),第7卷,第2期,1934年。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2册,第1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⑦ 参见《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史资料·第2辑上册》,第79-88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预备立宪”时期,法政科学堂因承担着传播新法推动新政的任务而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①。加之科举制废除后法政科成为官员选拔的主要渠道,学习日式高等教育体制产生了扭曲性的后果,造成八科学堂只有法政一科急剧膨胀。

五、共和革命与“以美为师”的政治学系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官员选拔转到了军队和政党手中,高等教育机构的政治精英生产功能萎缩。因为国体变更,日式高等教育体制不合时宜,中国转向模仿美国高等教育体制,中国政治学也由日式法科模式转向了美式政治学系模式。

(一)“官”“学”异途与“学”“术”分开

法政学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乱象,被当时社会舆论批评为“干禄”之术^②。舆论的诟病固然反映了法政科自身的问题,但同时也折射了共和革命后教育体制与政治体制关系变化导致评判标准的改变。

帝制覆灭后,革命党人领导的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将教育体制中“抵触国体者去之”^③。其中,有四点内容值得注意。第一,将大学宗旨改为“教授高深学问”。高等教育机构与政治精英选拔脱钩,不再颁发入仕资格凭证,其中心使命是“学问”。第二,取消经学科。这使得儒家“学统”彻底丧失形式上的主导作用,其对政治学的间接影响力也随之消失。第三,法科从原学科体系第二位下降为第三位。新学制明确规定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法科排在文、理之后,成为了从属性学科。第四,将法政科改为法科。由“法”与“政”并称,变为“政”从属于“法”,政治学的地位进一步下降^④。政治体制变化要求教育体制调整,要求办学模式变化。北京大学是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有着最为完整的建制,最能体现帝制向共和转型后高等教育机构变革逻辑,现以北京大学为例作进一步的说明。

民国初年,梁启超批评北京大学“官”“学”一体、“学”“术”不分,学生将“得官”当成“求学”目的,而“求学”反而成了“得官”的手段。他认为北京大学应是研究高深之学问的“大学校”,学生应抛弃猎官思想而“努力于学问事业”^⑤。梁启超兼具旧北京大学奠基者和新北京大学鼓吹者的双重身份,他的观点未必没有可议之处。毕竟,为帝制国家培养新型政治精英是梁启超为京师大学堂设立的建校原则,鼓吹脱离政治进程专注学理学问似有前后不一。帝制末期,高等教育机构承担着替代科举制进行政治精英生产的职责,高等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新型政治精英以推动帝制国家的政治变革,“求学”与“得官”浑然一体,“学”与“术”浑然一体。梁启超本人也曾触及高等教育功能变化的原因。梁启超认为维新派的变法活动是“讲学之外谋政治之改革”,“学校与政党而一之”^⑥。照此而言,共和革命后,政党广泛介入到政治过程中,政治变革和政治精英的选拔就应该转到政党身上,而北京大学就应该随之调整自身的角色,专注于学理学问。

与梁启超一样,蔡元培也批评北京大学轻视学问,批评学生皆有“做官发财的思想”,主张变

① 参见翟海涛:《法政人与清末法制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

② 《时报》社论:《论今日士气学术之颓废》,《时报》,1913年6月1日。

③ 蒋维乔:《民元以来学制之改革》,陈学恂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中册,第16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④ 《1912年12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令》,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3辑下册,第1-2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⑤⑥ 梁启超:《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梁启超全集》,第15集,第53页,第51页。

革北京大学办学模式^①。蔡元培将高等教育机构分为两类:“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属于“学”的范畴,而法、医、农、工、商五科则属于应用性的“术”的范畴^②。大学重在“学”,而专科学校重在“术”^③,两者性质不同。蔡元培认为北京大学应专注于学理学问,集中精力发展文、理二科,其他应用性的五科则可划归其他学校。

(二)大学再造与废“科”设“系”

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蔡元培的改造加强了北京大学的学问学理取向,淡化了其政治化官僚化色彩,同时削弱了其政治精英生产职责。

北京大学原有文、理、法、商、工等五科。按照蔡元培“学”“术”分立的主张,北大的法科、商科和工科等因属于技术应用性学科而不再保留。蔡元培分别扩充了文科和理科,将工科划给了北洋大学,将商科并入法科,并筹划废除法科^④。蔡元培的行动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其所有尝试都是成功的,更不意味着改造进程中没有遇到阻力。实际上,政治学所属的法科改造起来很是棘手。法科集“官”气、“术”气于一身,最与蔡元培的办学理念相冲突。时人将法科当成是“干禄之终南捷径”^⑤,对之趋之若鹜,法科人数超过北京大学人数的1/3。蔡元培接任校长之初,就有媒体报道蔡元培打算裁减北京大学法科和工科^⑥。后来,蔡元培成功将工科剥离,可是法科裁减却未能如愿。法科在北京大学地位特殊,蔡元培裁减法科的主张不仅遭到师生反对,更面临教育部的异议。

其后,蔡元培调整了思路,转向了学习美国大学模式。美国内战后,“莫雷尔赠地法案”(Morrill Land-Grant Act)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向实用性技术性方向转变。美国大学表现出不同于德国研究性大学的特征,即其学问学理取向与技术应用取向发生融合。在蔡元培看来,美国大学“采用新法”将研究性取向与技术应用性取向“打通一气”,超越了德国大学将两者分立的模式^⑦。也就是说,按照美国大学模式标准,提升大学的研究性取向并不必然以裁撤技术应用性学科为前提。由此,蔡元培放弃了裁减法科的计划,转而调整大学二级机构的关系。

1919年,蔡元培废除了日式分科大学制度,仿照美国模式以“系”为基本办学单元重组北京大学。在此之前,北京大学延续了清末日式分科大学体制,校级机构之下设立文科大学、理科大学、法科大学等,各“科”是基本办学单元,教学安排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主要由各“科”负责。各“科”之下虽然设立了“门”,但是“门”的权限较小,教员聘请和学科建设等都掌握在各科学长手上。蔡元培双管齐下实施对大学二级机构的改造。一方面,权力上收。废除各科学长制,组建校级的教务处和总务处负责日常教学安排和行政事务等工作。另一方面,权力下放。将原来各“科”之下的“门”改为“系”,打破原来的“科”间界限,以“系”建“组”^⑧,如原法科的法律学门、政治学门、经济学门与原文科的史学门分别改为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和史学系,构成了第五组,选任教员和安排课程由各系负责^⑨。在此过程中,蔡元培重用留美学生,替代日系教员。

①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高平书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② 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新青年》,第3卷第6期,1917年8月1日。

③ 蔡元培:《在爱丁堡中国学生会及学术研究会欢迎会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4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④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51-35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之演说》,第5页。

⑥ 《专电》,《申报》,1917年2月9日。

⑦ 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高平书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⑧ 《北京大学之新学制》,《申报》,1919年10月11日。

⑨ 《国立北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15日。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使得中国政治学的演化轨迹发生变化,由学习日本法科模式转向了仿效美国社会科学模式。废“科”之后,北京大学又建立新的研究机构。1920年7月,北京大学宣布仿照美国大学的“办法”,成立国学、外国文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4个研究所。其中,社会科学研究所将法律、政治、经济、外国历史、哲学等系纳入其中^①。社会科学研究所涵盖了原法科之下的所有“专门”,政治学成为了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

六、结论与讨论

自晚清到民初,中国政治发生剧烈变迁。从君主专制框架内的维新变法,到变更君主专制政体性质的“预备立宪”,再到改变国体的共和革命,中国政治变革道路屡次发生断裂性变化。政治变革道路的断裂性变化导致知识体系和教育体制的相应调整,造成中国政治学萌芽时期的断裂性演化。所以,我们看到,维新运动时期建立了儒学底色的“政学”学校,清末新政时期转向仿效日本模式建立法政科,辛亥革命后转向了学习美国模式建立政治学系。然而,中国大学政治学系的建立更多的是模仿美国大学学科设置,而不是出于解决中国社会变迁问题的实际需要^②。中国在建立政治学系时,仍是传统农业社会,社会发育程度不足以支撑美式社会科学。仿照美国社会科学模式建设政治学系,固然可能弱化中国政治学的“官”“术”色彩,矫正“猎官”“干禄”的弊端。但是,片面追求“研究高深学问”^③,也就疏离了政治学与政治变革进程之间的关系,难以为国家培育合格的政治行政人才。那个时期的中国政治学不得不悬浮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既无法推动国家进步,又不能促进社会发展,成为缺少“功能”的“结构”。“研究高深学问”就可能成了“言必称希腊”的借口,导致后来为毛泽东所批评的“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④的现象发生。

作者:程文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市,210023)

(责任编辑:林立公)

① 《公布研究所简章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7月30日。

② 许美德:《中国大学1895-1995: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第75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高平书编:《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